驱车从宝平公路沿崆峒区大寨塬顺势而下，进入土谷堆到华亭安口镇数公里的小山沟，有一幢耸立在路边的四层楼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曾是这里的一个繁华与显赫的存在，如今，楼房破败不堪，窗户破碎无几，周围长满蒿草，如同一位茕茕独立的憔悴老人，诉说着青春不在的失落和沧桑岁月的无奈。它就是“三线建设”之一的5207厂（**跃进机械厂**）搬迁至北京燕郊后遗留的旧址，也是平凉地区“三线建设”辉煌时期标志性建筑之一。

一路过纪家庄经石堡子抵达华亭，原“三线建设”的其中的5203厂（**国营胜利机械厂**）、5204厂（**国营前进机械厂**）、5213厂（**国营解放机械厂**）及“五二医院”（**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与它的面貌截然不同。这里新建的60万吨煤制甲醇厂以新时代的气息赓续着军工企业的活力，利用原厂区建成的华亭工业园区，随着入驻企业门类增多，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园区内一派生产繁忙景象。

昔日那些军工企业在完成祖国“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后从山沟里搬迁撤离，但军工人、北医人的顽强拼搏和无私奉献精神，以及他们为国家“三线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创造的建设成果和浓墨书写的动人篇章，成为一座弥足珍贵的历史画卷，永远铭记在华亭人民心里。

选址华亭的主要缘由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局势变幻莫测，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中苏、中蒙边境边境冲突不断，严重威胁我国安全。1964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直接威胁我南疆。海峡对岸“反攻大陆”的气焰越发嚣张，国家面临四面受敌的境遇。为做好随时抵御来犯之敌准备，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当年8月，中共中央按照地理位置和工业布局结构决定，确定沿海地区为一线，华中地区为二线，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三线。以三线作为战略后方，集中力量开展“三线建设”。根据“三线建设”战略目标，国家建委按照“大分散、小集中”和少数国防尖端项目“靠山、分散、隐蔽”分布的原则进行搬迁建设。

平凉地区作为甘肃省战略大后方建设的产业地带之一，靠近六盘山，素有“旱码头”之称。自古为陕甘宁三省交通要塞和陇东传统商品集散地，西兰公路穿境而过，交通运输条件便利。辖区内的华亭县，地处甘肃东部，关山东麓，陕甘宁三省在此交汇。从汉代就是皇室牧马之地，历史上在其南北曾设有萧关（**又称陇山关**）和大震关（**又称陇关、故关**）两个军事要塞，是陇州通往陇西的进入兰州的重要关隘。宝平公路横穿安口古镇，北可以通往陇东“旱码头”平凉，南可直达陕西省宝鸡市，区位条件优越。境内煤炭资源富集，就近利用便捷。全境森林覆盖面积广，植被茂密丰盛，天然次生林广布。发源于关山的汭河支流较多，分布范围大，水资源丰富。具备“三线建设”的建设原则和地理环境。

华亭“三线建设”变迁始末

1965年，甘肃省党委、甘肃省军区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在华亭县新安公社（**现安口镇**）纪家庄大队的小庄黑沟两条全长1.2公里的山沟（**东风沟、革命沟**）中建设“小三线”工程之一的国营华丰机械厂（9936厂）。主要任务是生产54式高射机枪，形成年产54式12.7毫米850挺高射机枪。当年6月破土动工，1970年底建成投产。54式高射机枪的高射和平射性能高，对低空飞行目标和地面的装甲、车辆、碉堡等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是当时我国主要的防空利器，隶属省军区国防工办管理。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后。面对苏联的核打击威胁，中共九大召开后，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全国性“三线建设”第二次高潮随之到来。针对打击苏联T-62型坦克暴露出的弱点，开始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的“大三线”工程。随之第五机械工业部在平凉部署新型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基地，配套建设5203厂、5204厂、5213厂及5207厂。

1969年9月，按照“靠山、分散、隐蔽”和不与民争地的选址原则，由兰州军区国防工办、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国防工办及五机部联合组成选址小组，决定在华亭县新安公社（**今安口镇**）石堡子、纪家庄及其毗邻的平凉县大寨公社（**今崆峒区大寨乡**）土谷堆一带抢建一套新型40火箭筒和炮弹厂。这里天然次生林茂密，隐蔽性好，加上策底河下游水源充足，可以满足生产生活要求。确定5203厂（**国营胜利机械厂**）、5213厂（**国营解放机械厂**）、5204厂（**国营前进机械厂**）分布在华亭县新安公社石堡子大队，5207厂（**国营跃进机械厂**）选址在平凉县大寨公社土谷堆大队的山沟峡谷中。“五二医院”（**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定在新安公社纪家庄大队纪家庄生产队宝平公路和关卡子河西侧的山坡上。

1969年10月成立“五二工程”总指挥部，领导来自国家第五机械部、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甘肃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平凉地区等有关部门。“五二工程”由四个军工厂组成，5203厂主要生产40毫米火箭弹弹体，5204厂主要生产引信和点火具，5207厂主要生产40毫米火箭筒及瞄准镜。5213厂为总装厂，负责将5203、5204、5207三厂生产的部件组装成火箭弹。四厂均于1970年7月动工建设，1973年全面建成投产后，“五二工程”建设指挥部更名为“五二总厂”，对外称“国营陇东机械总厂”，隶属五机部管理。

“五二工程”建设学习借鉴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等厂“政治建厂”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采取“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和“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办法，加快建设进度。建厂初期，来自湖南，西安，山西、上海、北京等地援建的兵工单位及平凉各县民兵上万人参加建设，他们住在厂房，挤大通铺，在山沟里建成一个如小县城一样规模的厂区。这在当时是华亭县一次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

1973年投产后，除在本地招收职工，还从外地接纳中专技校毕业生，整个52军工企业职工与家属数量一度超过十万人。这里不仅设有商店、剧院、学校，体育场所，还在节日里举办文艺活动，当地人羡慕不已，有山沟里的“小上海”之称。跟随父母从天南海北来到小山沟的职工子弟，有的参与工程建设，有的从这里学有所成后奔赴祖国各地，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

1975年，5213厂并入5203厂，之后“五二总厂”也撤销。华亭境内的“大、小三线”工程从建厂到投入生产，只用7年时间，分别建成了中国西部有影响的高射机枪和反坦克火箭弹配套生产基地。69式40毫米火箭弹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大显神威，立下赫赫战功，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据说，解放军163师班长蒋荣伟发射了10枚新型40毫米火箭弹，摧毁了敌方9个火力点，立下一等功。

1979年随着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按照“军减民补”方针，军工企业进入“保军转民”改制。1980年，5203厂开发生产“熊猫”牌系列自行车，加挂“西北自行车厂”5204厂生产“虎牌”系列保险锁，加挂“金城锁厂”9936厂生产“洗衣机”等民用产品，取消军用产品生产任务。自行车、系列保险锁、洗衣机等产品投放市场后一度受到热捧。后来由于各种因素，经济效益逐渐下滑。1984年7月，9936厂并入天水5206厂（**岷山机械厂**）搬迁撤离。1988年7月，5203、5204两厂划归首钢，分别更名为“首钢胜利机械厂”和“首钢前进机械厂”，整体退出军工序列。1998年，原5203、5204两厂搬迁至兰州皋兰县。5207厂迁到北京东部燕郊。

名誉陇原的“小北医”

为了配合“五二工程”建设，1969年11月，包括北京301医院专家、北京医学院本部教授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在内，从北大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市人民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京医学院各附属医院挑选的178名工作人员，先期到达华亭县安口的临时驻地后，一部分开始战备医院筹建和协助安口卫生院及安口厂矿卫生室工作。另一部分人员组成四支医疗队，分赴平凉、崇信、庄浪、华亭四县偏远山区，开展巡回医疗。1970年4月医院正式动工建设，当时，几乎所有工作人员每天徒步往返于13华里的安口住地和纪家庄建设工地之间，早出晚归，共同参与医院建设。年底医院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工作人员有序搬进了固定住所。1971年7月医院整体建成并开始诊疗，命名为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平凉二院”**）。

平凉二院建成以后，凭借齐全的科室、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以及华亭原生中药材广布优势，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声誉名震陇原。除诊治“三线建设”军工企业、各厂矿、平凉各县群众以及庆阳、天水、兰州等地患者外，来自陕西、宁夏、青海、河南、山西等省区的患者也慕名就医。每天门诊量均在1千人次以上，医院病床扩大到200张，医院工作人员增加到193人。在西北地区享有“小北医”的声誉。

1977年夏，因地质原因，医院基础设施受损，平凉地区革委会拟将平凉二院迁至平凉市西郊。1979年省计委批准撤销地区二院，并入平凉一院，医务人员、设备并入平凉一院进行扩建。1982年初，平凉二院正式并入平凉一院。从1979年从医院撤并开始，医务人员陆续调离，截至1985年大部分调入大城市或返回北京。

“三线建设”的精神灵魂

关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策底河水依旧清澈，沿岸树木仍然青翠，空中白云还在飘荡，它们共同托举起深山密林间升起的又一缕新的耀眼曙光。时光渐渐远去，荣光慢慢褪去，曾经的那群热血青年如今都渐渐变老，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却传承为一个时代的经久回响。正如曾任原5203厂党委书记兼厂长、5204厂党委书记的刘木在《关山5203军工魂》一书的序言中所述，“五十多年前，有一大批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学业，从城市兴致勃勃地走进深山，参加大三线建设。既有各行业的管理精英，还有部队军转干部、复员军人和刚刚从大中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没有退缩而是挺身而出，脱掉学生装，穿上不合身的工作服，自觉地把自己定格在大三线建设。忘我工作，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从不叫苦。他们建设大三线的光和热在寂静的关山深处拼发。只用了二年时间，现代化的军工企业就在深山建成投产，堪称军工建设的奇迹。这些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多个视角反映了他们心系三线，不负韶华的精神风貌。关山军工魂成了他们精神营养的源泉，滋养着他们人生的光辉！”。

华亭市在军工企业的原址上建成“三线建设文化园”，修建的“三线建设博物馆”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吸引数千人参观学习，成为传承红色记忆的历史坐标。华亭市政协挖掘整理并结集编印了内部交流书籍《关山5203军工魂》《北医往事》等。原华亭县广播电视台摄制的电视纪录片《五二年华》入围第八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如今，网络、抖音、快手、APP新媒体平台展现的文字和影像，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传递着“三线人”对往昔岁月和“第二故乡”的思念，许多古稀之年的退休职工也常来这里聚会，举办纪念活动，追忆曾经经历的美好岁月。

“三线人”奋斗拼搏精神，成为遗留在华亭大地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平凉记忆

认识唐朝的角度和维度有很多。

我曾经从唐诗里仰望过一个朝代的盛大气象，只有唐代，才敢于以《千家诗》的气魄来检阅一个朝代史无前例的诗人方阵！

我曾经从乾陵的无字碑上，阅读过一个朝代无与伦比的自信与从容，只有唐代，才敢于以这样的姿态去面对史学家的严苛与挑剔，才敢于去挑战盗墓贼狡黠的目光！

从临潼华清池温软的泉水里，我曾触摸到一代王朝质感的纹路与肌理，只有唐代，才会把一代帝王帝妃的爱情演绎得如此浓艳缠绵又如此凄恻惨烈！

在气势磅礴的长安古城墙上，我感触到一个王朝的坚挺与硬度，也只有唐代，才敢于把历史书写得这般方整这般厚重，充满大气与霸气！

这是一个既有《霓裳羽衣曲》的柔婉，又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般刚烈的独一无二的朝代。

但我第一次感性的认识唐朝，却是从昭陵开始的。1981年春节刚过罢，我第一次走西安，坐的是班车，沿着312国道一路向东，下长武，过彬县，穿过幽深的底角沟，爬上狭长的永寿梁，眼前豁然开朗。平坦如砥的渭北平原在车窗外匆匆掠过：天原来可以这般空阔，塬原来可以这般浑大啊！第一次出远门的欣喜，让我看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南边的黄土塬面几乎没有一点遮挡，平展展的一直向远处延展，最后消失在更远处一片模糊的雾霭里；北边的塬面尽头，有一条低矮的连绵不绝的黑色线痕在远方的天空下低调地起伏着。路在延伸，班车在行走，那条线也随之在延伸，在行走。后来，我才注意到，原来那是一座山！不，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一溜儿山，就像是一队整齐的山，列队站立在那里，仿佛等着什么人的检阅似的。班车在奔驰，那山的队列似乎一直匍匐着，并无大的起伏，但突然间，那条平缓的黑线突然直撅撅地挺了起来，一个不太规矩的方形山头像是从蹲着的群山中突然站了起来。我在心里问自己：这会是什么山？

20年后，我才知道那座山叫九嵕山，山上有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就长眠在那里。

又过了20年，2020年10月4日，在逛了袁家村后，我第一次去寻访九嵕山，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去仰望一个朝代的高度！

车子在山路上盘桓而上，和我多年前多次远眺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九嵕山并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峰，从山脚下到半山腰，竟然有40分钟的车程。山路崎岖盘旋，山上植被稀少，当然这一切与季节无关，因为这是一座石山，本身就没有什么植被。但印象最深的却是这漫长山路上的寂静：没有行人，少有车辆，只有满眼黑黜黜的石头，只有一条盘来绕去的盘山公路！和人山人海的秦始皇陵不同，和人声喧嚷的乾陵不同。刚从山下人声鼎沸人潮涌动的袁家村出来，突然置身于死寂的九嵕山，仿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时竟有点不适应，这一闹一静的对比也太明显了。

九嵕山，寂静得让人感到意外！寂静得让人措手不及！

接近山顶一个平缓的山窝处，车子终于停了下来，远远地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山门。远远地，一尊高大的石雕出现在眼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腰系九环带，脚蹬六合靴，那应该就是李世民了，和秦腔戏中他的装饰一模一样。30元的门票，这应该是关中大地上诸多帝陵中门票最低的一个。

进入陵园大门，迎面看到的就是那尊高大的唐太宗的石雕：双手握着玉带，目视远方，神态威严，自信满满。石雕两旁，左右对称扇形排列着三组华表，众星捧月般拱卫着唐太宗，居高临下，气势如虹。再往里走，是一通石碑，上书《唐太宗昭陵》，是新刻的，年代应该不远。拾级而上，便是长长的神道了，神道两边，有雕工古朴的石羊蹲卧两边。地面上没有任何建筑，原有的建筑，包括陵园最顶端的献殿，现在都只剩下了殿基，巨大的础石，偶尔残留的一星半点的石雕残件，尽管残损，纹饰却精致，至少能证明当年这些恢宏建筑的规模之大，工艺之精。靠近献殿的石阶两旁的石壁前，各竖立着三块石碑的浮雕，这便是著名的昭陵六骏。浮雕是新刻的，工艺虽然精湛，但因为少了时间的磨洗，没有一点儿包浆，便少了让人驻足一看的理由。

有什么办法呢？毕竟1300年不是说着玩的，因为战乱，因为自然的风化，昭陵地面建筑被毁坏被侵蚀，荡然无存便是自然而然的。昭陵大量的墓碑和墓志，都保存在九嵕山下烟霞镇的昭陵博物馆里，能够反映唐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实物资料，以及展示初唐书法艺术高度的碑石，都在那里得到妥善的保管和全面的展示。但昭陵里那挪移不去的殿基、础石，还有那些擦拭不掉的岁月印痕却永久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九嵕山上。

九嵕山，昭陵，一个生前在泾河畔征战厮杀，一个开创了贞观盛世的英武君王，最后选择了头枕泾河的波涛长眠！这是李世民的睿智，也是泾河的幸运！

唐太宗为什么会选择九嵕山作自己的陵寝呢？

按照今人的测算方法来看，九嵕山山势突兀，海拔1188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中间隔着一个关中平原，南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亘及平野。九嵕山主峰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将主峰高高拱举，成众星捧月之势。从地质构成上看，九嵕山为早期褶皱后经再断裂形成的断块山，由硅质、白云质、角砾岩组成，抗蚀性强，故地势高亢，北缓南陡。古人当然没有办法去测量九嵕山的海拔高度，也没有技术去测定九嵕山的石质构成。但九嵕山石质坚硬，以山为陵，坚固不摧，可能是太宗陵选址的一个重要前提；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古人最为看重的风水理论在这里占了很大的比重。中国古代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伴随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播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时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风水评定理论。最早从秦始皇开始，帝陵的选址就已经赋予了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此框架下，九嵕山满足了堪舆家所认定的帝王陵阙应具有的所有条件，自唐以降，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在我看来，九嵕山众山拱卫，一山独尊，面南背北，高高在上，俯瞰天下，契合了帝王死后依然想要君临天下统御万物的强烈愿望。这从后来唐太宗让自己100多位臣子和嫔妃陪葬在自己的陵墓之下的意愿就可以看出来，山上太宗墓高居中央，山下陪葬墓成扇形排列，形成一种强烈的虽死犹生、视死如生的庄严感和仪式感。

636年，皇后长孙氏病逝，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要薄葬的遗言，把她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新凿的石窟里，命名为昭陵，随后又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从这一年开始，昭陵大规模的营建工程拉开了序幕，至649年，唐太宗驾崩入葬，营建工程前后持续了13年。

昭陵工程的总设计师是出身于工程世家，先后担任过唐朝将作大匠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华夏族帝王坐西向东的葬制，也不是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帝国中王公贵族的“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为皇帝起居之所，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为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太极宫，除主陵墓道地宫以外，还在陵山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同时，昭陵陪葬沿袭了汉代的制度，就是将皇陵余地赐给亲属、功臣、将相，用以陪葬。长孙皇后首葬于昭陵后，唐太宗次年二月就颁布了《九嵕山卜陵诏》，除明确规定把昭陵作为自己和皇后的陵墓外，还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接着，他又下发补充诏书，允许子孙从父祖而葬昭陵。在太宗的号召下，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先后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昭陵主陵居于陵园最北端的九嵕山主峰，190余座陪葬墓以陵山主峰为轴心，呈扇面分布在陵山两侧和正南面，犹如群星拱卫北斗星一样拱卫着昭陵。这情形恰似当年长安城的布局，帝王居住的大内居北，朝臣贵戚的府邸在南，象征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唐太宗以九嵕山建昭陵，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后来的乾陵便是受了昭陵的影响，以梁山为陵，成为唐代帝王陵中的另一个奇迹。

昭陵建成以后，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定期或不定期地前往祭祀。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把北司马院称为“祭坛”，这在历代帝陵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历代皇帝的祭陵碑，著名的昭陵六骏和14国酋长像等都树立在这里。其碑石中，最早的为唐太宗撰文、欧阳询书写的《昭陵刻石文》碑，继之有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的祭文碑；再到唐之后宋、金、明、清等朝代，陆续树立起来的各类御制祝文碑30余通。唐高宗初年，在昭陵北祭坛上树立起代表11个邦国的14位酋长的石像，记录了贞观年间唐朝开拓西域，与邻邦关系友好和睦的盛况。后来这些石像均遭破坏，只剩下多件有题名的石像座，以及部分石像的残块。

进入20世纪，令昭陵名声大振的是“昭陵六骏”石雕的被盗。作为开国皇帝，唐太宗在马背上度过了数十年战争岁月，他爱马成癖，在昭陵开始营建时，唐太宗让著名画家阎立本设计，将自己平生所骑过的6匹骏马描画成形，采用高肉浮雕法刻在青石之上，陈列在北侧祭坛的东西两庑房内，每边陈列3尊，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昭陵六骏”。“六骏”都有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李世民亲自作诗6首，赞扬它们的风采，这就是传之后世的“六马赞”，由欧阳询抄录下来刻在“六骏”旁边。昭陵六骏初刻时，各高2.5米，横宽3米，在青石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为“高肉雕”。六骏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造型威武雄壮，栩栩如生，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高度成熟。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其生前仪卫之形，也不采用其他帝王陵墓石刻所赋予的祥瑞、辟邪之意，而是独具一格，采用写实手法，极具美学意义，风格大异于中国传统陵园石雕作品。

“昭陵六骏”的命运充满传奇色彩，最初它们是放置在昭陵献殿，背靠后檐墙而立。1914年，六骏中的“飒露紫”“拳毛騧”二骏，被盗运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现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

时间过去了1370年，耸立在泾水之滨的九嵕山依然崔嵬，静卧在九嵕山昭陵中的唐太宗依然高高在上，安葬在九嵕山下他的大臣和嫔妃们依然匍伏在他的威仪之下。按照当初的规制，昭陵或者以墓葬的地理位置，或者以墓葬的规格来表现陪葬者的亲疏与等级。从墓葬地理位置上看，唐太宗的妃子和嫡出的公主都陪葬在靠近陵山的地方，大臣中享受这种礼遇的目前已发现的只有魏征墓、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3座墓。魏征是贞观时最为有名的良相，太宗评价他“贞观以后，魏征之功”；阿史那思摩和阿史那社尔都被封爵郡王，是北方突厥民族入唐为官者的代表性人物。其他的如庶出的公主、王子和文武大臣大多陪葬在山下平原，多为太宗一朝的主要文臣武将。近数十年来，通过考古手段对整个陵园实地考察，已确认昭陵有193座陪葬墓，有相当部分属夫妇合葬墓。其中经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的有徐懋功（**李绩**）、尉迟敬德、程咬金、张士贵、郑仁泰、长乐公主、韦贵妃等40余座陪葬墓，全是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众多的陪葬墓衬托了主陵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整个陵园气势恢宏，呈现出只有盛唐才具有的气象。

1961年3月4日，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古人的风水理论，讲究阴阳一理，活人住的阳宅和死人葬的阴宅，都寄寓了避风向阳、抱山环水的美好愿景。但昭陵却开创了因山建陵的先河，整座陵寝北靠九嵕山巅，南望太白终南诸峰，俯瞰关中平原。从遥远的陇山深处一路长途奔来的泾河，从九嵕山身后的大峡谷中一泻而出，然后温柔地在昭陵的左侧划了一个弧，形成了对这座帝陵山环水绕的最后守护，完成了对这位昔日在泾河边纵马扬鞭驰骋战场，如今安卧在九嵕山上的英雄的最后敬礼，然后悠然远去。

虽然历经自然风雨的剥蚀，经受非常年代的兵荒马乱，陵山地表上的建筑早已毁坏无遗，但游殿、最初安厝长孙皇后的石窟以及栈道遗迹仍清晰可辨，昭陵依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唯一架有栈道的帝陵，在中国乃至世界帝陵建制上有着独特地位。

下山来到烟霞镇，走进昭陵博物馆，我们看到以昭陵为主题的出土文物、碑林、唐墓壁画等展品陈列。最为珍贵的还是那些石碑，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唐贞观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的祭陵碑，石碑字迹漫漶脱落，泯灭难识，仅存“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臣韩云卿述并书”15字；其次是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所立的“御制祝文”碑；在30余通祭陵碑中，立碑最多的是清代，康熙皇帝7通，乾隆皇帝3通。有趣的是，徐懋功（**李绩**）墓就在博物馆的后面，他的墓也是距离太宗墓最近的墓葬之一，他们生前是君臣，现在该是互相陪伴，打发无聊时光的玩伴了吧！

回望九嵕山，这座卓尔不群的山中佼佼者，相对于长年累月万头攒动，日复一日被成千上万的游人践踏着的秦始皇陵和乾陵，昭陵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但它又是孤傲的，甚至是幸运的：盗墓贼觊觎的目光不敢正视它，心怀鬼胎的脚步不敢光顾它，而它则可以高昂着头颅，雄视万方，静观人世间千百年来的波谲云诡、风云变幻，静听泾河的涛声一路东去……

文史连载